

“边缘的兴起”： 对当代德国政党体制 变动的解析^{*}

张佳威 吴纪远

摘 要：德国正式进入后默克尔时代，与16年前相比，政党体制的剧烈变动是当前时期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联盟党和社民党的统治基础被严重侵蚀，以往的主导地位逐渐失去；而先前在联邦层面位处“边缘”的一众小党则实力不断提升，逐渐接近权力中心。对此，文章从政党类型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围绕政党能力的发生机制，提出了分析德国政党体制变动的全新架构。文章认为，在应对新兴技术和各类危机的“冲击”中，基于不同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德国各主要政党选择了差异化的战略，致使其所处的国家与社会间权力结构位置发生变化，逐渐具有了新的能力生产逻辑。从结果上看，以全民党的卡特尔化和利基党的群众化为表征的双向权力运动，成为当代德国政党体制变动的关键进程。

关键词：政党类型；政党能力；组织体系；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1620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D7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2)01-0044-20

^{*} 本文获2020—2021年度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基金项目的资助。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传统上,德国的政党体制以稳定著称,有学者将之归纳为“两个半党”^①:联盟党(Union)与社民党(SPD)长期垄断政权,最多时能够控制94%的联邦议院席位,在本世纪初仍能维持近八成的得票率,是公认的“全民党(Catch-all Party)”^②;而“半党”则反映出原先德国政党之间实力和地位的巨大差距,两大核心党之外的其他联邦议院政党往往被归为“利基党(Niche Party)”^③,对整个政治格局的影响力有限。

但近来的一段时期,德国政党间原有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图1所示,德国政党体制的变动非常明显,两大党与众小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最新一届的联邦议院大选再次出现六个政党的政治格局,延续了四年前的碎片化特征,一种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谓的“极端多党体制”已然成型。^④其中,联盟党创下历史最低得票率,失去了优先组阁权,而两大党控制的议席比例也跌至谷底,较巅峰时期下降近五成。反观联邦议院中的一众小党,其选举绩效则大幅提高,除了绿党(Alliance 90/The Greens)被视为2021年大选的最大赢家外,德国选择党(AfD)近两次的得票率均超过了10%,已经能与同样位于政治光谱右侧、历史上频繁扮演“造王”角色的自民党(FDP)齐头并进。不仅如此,这些小党在超国家层面的欧洲议会以及地方层面的德国州议会中的表现同样突出,权力的扩张呈全面性特征。例如,绿党在2019年就超过社民党成为了德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二大党,它还出现在全德16个州议会中的10个执政联盟中,并多次与意识形态对立的政党合作,运作方式愈加纯熟。显然,众小党对于德国政治格局的影响力早已突破了“半”的内涵,其实力的快速增长正撬动着整个政党体制,而两大传统核心政党因统治基础被严重侵蚀而逐渐失去以往的主导地位。^⑤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向来稳定的德国政党体制为何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动?在这一过程中小党又是如何赢得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① 伍慧萍:《德国政党体制的变迁》,载《德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12-19页。

^② 关于利基型政党的定义参见:Bonnie M. Meguid, “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 The Role of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y in Niche Party Suc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 No. 3, 2005, pp. 347-358, here p. 348.

^③ [意]G. 萨托利著:《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80页。

^④ 相关代表性讨论见:David P. Conradt, “The Shrinking Elephants: The 2009 Election and the Changing Party System”,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8, No. 3, 2010, pp. 25-46; Dan Hough, “Small but Perfectly Formed? The Rise and Rise of Germany’s Smaller Parties”, *German Politics*, Vol. 20, No. 1, 2011, pp. 186-199; Thomas Poguntke, “Towards a new party system: The vanishing hold of the catch-all parties in Germany”, *Party Politics*, Vol. 20, No. 6, 2014, pp. 950-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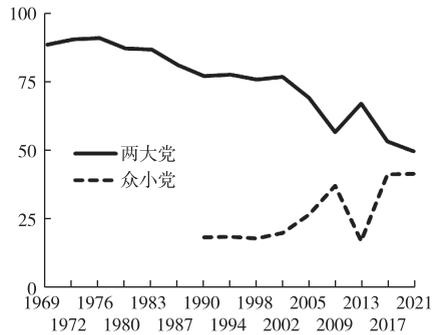


图1 德国联邦议院政党的得票率①

图为笔者自制,数据来源: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网站, <https://www.bundeswahlleiter.de/en/bundeswahlleiter.html>, 访问日期:2021-11-01。

学界先前关于这类问题的解释大致可归纳为两种典型的理论路径,即“外因决定论”和“右翼标签论”。前者将政党活动的核心变化归结于外部因素,基本预设是环境的变动直接改变了德国政党竞争的基本面,尤其是持续不断的各类危机导致长期执政的联盟党与社民党陷入了国家和政党治理的双重困境,而当局的部分应对举措在承担巨大政治风险的同时却没能有效化解难题。两大党支持基础的动摇以及政治极化的加剧使得选民不仅在投票中出现了新的分化与重组,并且还会采取惩罚式的投票行为,或支持立场更为激进的政党。全民党的衰落实属必然。^②“右翼标签论”则将政党的意识形态属性作为核心解释条件,认为极右翼政党契合了当前时代变局的大潮,在凝合国家主义、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社会力量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自然能够在与其他势力的竞争中占据主动。^③显然,与“外因决定论”意在投射主流政党的执政困境不同,“右翼标签论”聚焦在新

① 关于此图需做两点说明。第一,之所以将1969年作为起点,原因在于1967年《政党法》的颁布对德国政党体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二,2013年的结果似乎是“异常”的:众小党的得票率下降超过20%。但实际情况是:由于未跨过联邦议院选举得票率门槛,自民党、德国选择党以及海盗党所获得的近12%的选票均没能计算入内;对应的两大党得票率也仅反弹10%。因此,2013年的“异常”影响有限,德国政党体制整体的多元化趋势是明确的。

② 相关代表性讨论见:Constantina Badea/Jean-Louis Tavani/Mark Rubin/Thierry Meyer, “Self-affirmation, political value congruence, and support for refuge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 47, No. 7, 2017, pp. 355-365; 田德文:《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与走势》,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第114-122页;Sidney A. Rothstein/Tobias Schulze-Cleven, “Germany After the Social Democratic Centur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balance”, *German Politics*, Vol. 29, No. 3, 2020, pp. 297-318.

③ Van Prooijen/Jan-Willem/André PM Krouwel/Julia Emmer, “Ideological responses to the EU refugee crisis: The left, the right, and the extrem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Vol. 9, No. 2, 2018, pp. 143-150, here p. 148.